

语文教育新论

语文 言意论

不但观察细致，
更善于冷静分析，
能从错综纠缠的现象中
抽绎出历史头绪，
敢对习焉不察的所谓『公论』
给予重新评价。

彻底抛弃了

只在事物外固归纳求证的传统做法，
而将探索的触角深入到本体内部，
真正抓住了语文活动的
心理机制和发展动因。

这就廓清并超越了

有关学科性质的众多争论，
从教育哲学的层面上
为语文教改指明了方向。

李维鼎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李维鼎 著

语 文 言 意 论

上海教育出版社

语

文

言

意

论

SHANGHAI JIAOYU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言意论/李维鼎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0.6

(语文教育新论)

ISBN 7-5320-6849-8

I. 语... II. 李... III. 汉语-语言教学-教学理论
IV. H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2049 号

语文教育新论

语 文 言 意 论

李 维 鼎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 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9.5 插页 4 字数 222,000

2000 年 7 月第 1 版 200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150 本

ISBN 7-5320-6849-8/G·7005 定价:(软精)18.00 元

序 言

权曙明

1997年夏,《语文学习》关于语文课程性质的争鸣正处在僵持状态,有一篇来稿对此作了十分准确的描述:

“语言”与“言语”与“语文”与“语文学科”,已经被搅成了一团。论者们可以根据自己论证的“需要”(!),往往互相暗调甚至明换,使论争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交锋,往往在虚晃一枪之后仍然自说自话。笔者认为,为了真正讨论问题,大家都不要回避矛盾,首先可以做的是都后退一步,把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弄清楚,正本清源之后再实事求是地作出更深层次的探求和阐述。

来稿人就是本书作者李维鼎先生。本书就是作者在“正本清源之后再实事求是地作出”的“更深层次的探求和阐述”。他不但观察细致,更善于冷静分析,能从错综纠缠的现象中抽绎出历史头绪,敢对习焉不察的所谓“公论”给予重新评价。如果真像科学哲学家卡尔·R·波普尔所言,人类科学史其实是一部“证伪史”的话,

序 言

这才是当今语文教育界最可宝贵的科学态度。“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孟浩然语)。自本世纪初语文独立设科以来，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工作者对语文学科的目的、任务和内容、方法已作了深入研究，但任何研究成果都只能说明过去，倒是美中的不足之处往往成为未来发展的契机。

记得1983年全国中语会在京召开第三届年会，尊敬的叶圣陶先生在回顾了二三十年代的语文教育弊病之后说：“现在并没有完全改变”，“非改革不可”，“年纪越大的人，心越急”(《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233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8月)。又有十几年过去了，语文教育每下愈况。请问当今的某些专家学者们，难道你们就不着急？或者我们就不该着急？我常暗自思忖，假使叶先生仍然健在，他是肯定希望能将这场语文教育大讨论进行到底的。

著书立说，似不必“毫无”功利考虑，但我对李先生的社会责任心不得不由衷敬佩。这从他那充分说理的、完全民主的思辨风格中就可略见一斑。作者非常明白，批判是为了继承，继承是为了发展。任何真理都只有相对的、暂时的意义，本不必摆出盛气凌人的架势。所以，对于传统中的某些缺憾，他都能设身处地地加以理解；对于不同意见者的些微转变，他也会实事求是地表示欢迎。倘若只是“为辩而辩”，怎么会有如此高雅的气度！

当然，本书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从历史与现实、整体与部分、科学与人文等方面，对语文教育的基本规律作出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论证与辨析，从而认定了让学生在言意互转的过程中“学言”“做人”这一基本途径。其思路之开阔，足以发人深思；至于结论是否正确，则可见仁见智。作者曾一再谦称，本书志在“抛砖引玉”，而在我看来，即便真是一块砖头吧，也已经抛到了当抛之处。它彻底抛弃了只在事物外围归纳求证的传统做法，而将探索的触角深入

序 言

到本体内部,真正抓住了语文活动的心理机制和发展动因。这就廓清并超越了有关学科性质的众多争论,从教育哲学层面上为语文教改指明了方向。

维鼎兄嘱我作序,卑之无甚高论,随便说了几句行外话,还望读者诸君见谅。

1999年10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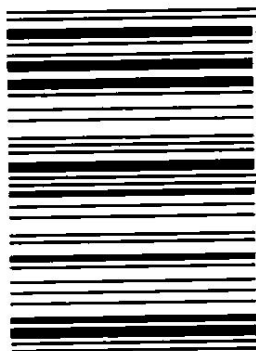
世纪集团

李维鼎，1937年生，江西萍乡人。196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长期在小学、初中、高中教“语文”。1981年后，在高等专科、本科学校中文系教“语文教学论”和“现代阅读学”。现为长沙电力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韩焕昌

封面设计／陈云

ISBN 7-5320-6849-8



9 787532 068494 >



目 录

导 语.....	1
第一章 “诗是人类的母语”	17
——“语言”与“言语”	
第一节 科学的界定:语言和言语	19
一 索绪尔的“言语”学说	20
二 “言语”学说在中国	24
第二节 不争的事实:言语是语言的母体	28
一 “言语”孕育了语言和语言学	28
二 “言语”是语言学研究不尽的源泉	31
三 “言语”与“语言”关系辨析的语文学意义	34
第三节 习惯的强势:言语与语言混淆的酸果	35
一 “三老”的术语混用	35
二 “大纲”的含混阐释	47
三 对“回甘”的追求	47

目 录

第二章 “必者正名乎”	52
——“言语”与“语文”	
第一节 “语文”即“言语”	55
一 叶圣陶为语文“正名”	56
二 叶圣陶“正名”的意义	59
第二节 “语文课”就是“言语课”	61
一 “言语作品”是教学内容的主体	62
二 “言语活动”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	67
三 “言语规律”是教学方法的本质	68
四 “言语能力”是语文教学的主要目标	69
第三节 语文本体的迷失	71
一 清澈、明净、质朴的源头	72
二 漫长、深邃、凝滞的上游	73
三 滩多、浪急、芜杂的中游	76
四 曲折、分岔、失道的“入海口”	84
第三章 “众里寻她千百度”	90
——对“语文”本性的探究	
第一节 内潜：心生说	92
一 言语生成的根本	92
(一)心生言(92) (二)言必诚(94) (三)言适境(97)	
二 言语理解的方略	100
(一)据言寻义(100) (二)神人文、文入心(101) (三)涵泳 体察(103) (四)知入知出(107)	
第二节 外显：工具说	111
一 工具说的源流	112
二 工具说的内涵	120

三 工具说的穷途	128
第三节 聚焦:人文说	136
一 新的语境	137
二 新的旗帜	140
三 新的内涵	144
四 新的话题	150
第四节 发散:多种性质说	155
一 简介三种性质说	155
二 独具一格的模糊说	158
 第四章 “掀起你的盖头来”(上)	164
——言语的生成与理解机制	
第一节 转换:言语活动的本质	166
第二节 差异:言语转换的动因	172
第三节 生成:痛苦之花的甜实	180
一 口语的生成	181
二 书面语的生成	183
第四节 理解:甜实的咀嚼	186
 第五章 “掀起你的盖头来”(下)	193
——“言意互转”是语文课的本性	
第一节 言意论之流变:历时的梳理	198
第二节 言与意的内涵:简略的阐释	207
一 释“言”	208
二 释“意”	211
第三节 言与意互转:整体的描述	216
一 表达:由“意”到“言”的转换	217

目 录

二 吸收:由“言”到“意”的转换	222
三 交际:“言”与“意”互转的概括	229
第四节 知识和生活:言意互转的条件	232
第六章 “会当凌绝顶”	238
——言意互转的新视界	
第一节 全息:言意互转的整体性观念	239
一 听、说、读、写反复结合,全息式发展言语能力	239
二 知、能、情、理始终统一,全息式发展言语主体	242
三 大语文和小语文息息相通,全息地构建 言语教育体系	247
第二节 过程:言意互转的动态性认识	253
一 注重“过程”:对“转换”的确认和实施	254
二 展开“过程”:对隐性“转换”的显性操作	258
三 确认“过程”:对“转换”主体的真正确立	266
第三节 和谐:言意互转的环境优化	268
一 传统语文教育和谐协同环境论的回顾	269
二 当代学校语文教育民主化、审美化环境营造	274
三 当代社会语文教育开放性、灵活性环境展望	277
参考书目	282
余 墨	285

导 语

过去的 20 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正好由 1949 年的新中国成立,划分为两半。前半个世纪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后半个世纪则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革命,自始至终都是世纪性的主题。风起云涌、前赴后继、艰难曲折、甘苦备尝的“活剧”,就是革命主题的“变奏”。革命,作为“最大的政治”,既是社会经济和文化的集中而又尖锐的反映形式,又是经济和文化的主宰。经济和文化都被强行纳入“政治”的旋律,众星捧月式地突出着“政治”。作为文化现象的教育,当然也不例外。“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虽然成文于 1958 年,但却是承前启后的“枢纽”。语文,因其自身的特性与思想最亲,离革命最近,跟政治最紧,所以语文教学的沿革、浮沉、进退、荣枯,就像是政治气候的晴雨表;革命阶段之间的短短缝隙的小小例外,改变不了总体走向。

这是一个让我们尴尬的判断。一方面,语文从 1903 年单独设科于现代教育起,就似乎未曾真正“单独”过,总是不能摆脱附庸的命运,因此一直发育不良、成长不全。像眼下对中小学语文教学质

量不高的责难,在历史上就至少有 1934 年对“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慨叹,有 1953 年对语言、文学混教而“两败俱伤”的议论和救正,有 1958 年教育部党组给党中央写的《关于提高中、小学语文教学质量的请示报告》中列举语文教学质量的种种低下表现,当然还有“十年动乱”造成的“白卷”水平引发的广泛而深刻的忧患。为什么语文教学质量问题成为“老大难”?为什么一场革命或者一场运动过后,语文教育质量问题如此引人注目?难道不是隐伏着什么规律,而只是历史的宿命!另一方面,语文教学又确乎在历史中蜿蜒前进,还可以让人们评功摆好,列数上十条百条成绩来“证实”,而“十年动乱”造成的“荒原”上,在新时期里也能“春风吹又生”,开放出引人瞩目,甚至炫目的改革新花,着实让人们感到振奋和喜悦。这中间又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难道只是偶然?使人更为难以想透的是,这一次由“误尽苍生是语文”引发的对语文教学质量的责难,倒是出现在拨乱反正之后,出现在取得炫目骄人成绩的新时期。难道,在语文教学这一小小领域,“拨乱”之后并未真正“反正”,许多的成绩只是在与“动乱”和“荒漠”相对照下的显赫?难道,我们并未真正地回到“语文正道”上来,以致让繁荣掩盖着问题,而时间的流逝又褪去繁荣,让问题水落而石出?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就可以认为拨乱反正开创的繁荣的语文教学改革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便有着浓重的政治色彩,或者,就是一种“需要”与“热情”相结合的政治活动,或称“准政治活动”。因为,既然语文教育是一门学科,最本质的需要不是别的,而是由责任和热情升华和提炼而成的冷静思考与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实事求是。只有实事求是,才有可能由否定到肯定,找到“正道”,走上“正道”。唯其如此,这个世纪性的难题才可能获得解决。

感谢时代,使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探讨各个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从革命、政治的角度去观察语文教学的历程,去思考其中包藏

的问题,求得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政治、文化的大背景中对语文教学作宏观的把握,并深入内里,求得根本性的观念调整。这种观念调整当然得从语文的本性是怎样迷失的开始;而这又与整个中国科学的遭遇有关,因为科学和教育都属于文化,更不说教育也是一门科学。因此,让我们说得远一点、宽一些。

科学和教育,一直是近代中国的中心问题之一。前述的这个世纪,甚至还可以前追半个世纪,即从1840年起,近代中国翻腾激荡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的过程,那就是如何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展科学和教育,以改变志士仁人们痛心疾首的落后挨打的局面,拯救民族、国家于水火。于是,便有“五四”时期,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延请。事实上,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一类的科学哲学和教育哲学从此相继传入,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是,因为既缺乏相应的物质条件,又缺少包括民主意识的精神准备,尤其缺少一种足以启迪思路、预示方向的哲学思想,被郑重引入的科学方法和实证精神等,最后也“都成了飘浮在中国传统文化上空的浮云,无法化为甘霖浸润到中国贫瘠的土地中去。后来,它们很快地消逝于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之中了。”(纪树立:《科学知识进化论·编译前言》)而强行的遵从,奉为“主义”的科学方法,竟然结出畸形之果,在社会的人文的领域令人齿冷。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和广大人民迎来了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马克思主义,大家以巨大的喜悦和信心,指望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随着物质条件的渐次改善逐步规范我们的文化科学;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全国范围里建立起统一的科学观和教育观第一次有了实现的可能。遗憾的是,人们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即人们只能透过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环境来接受、理解任何一种思想观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例外。

当我们的年轻的共和国正在全力巩固政权和恢复被破坏殆尽的国民经济的时候,人们对科学和教育的认识也不能不濡染上这个时代的色彩,不能不受到这种社会需要的有力牵引。更何况由于政治上“一边倒”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使我们的视野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在“老大哥”那里又没有取回什么“真经”,因为那时的“老大哥”念诵并且实行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版”。因此,建国以来,科学和教育一开始就纳入了被“两头牵引”和“挤压”的境地。一方面,“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前者是科学、教育对主流文化的认同,后者是科学、教育的实践基础。这种上下的牵引和挤压并非都不好,实事求是地看,也有必然的合理的一面。因为在社会文化的金字塔结构中,科学和教育都处于中层。从上面,要接受整体哲学(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和浸润,在下面,要有与经济基础直接相连的实践活动(三大革命)的支撑。与此同时,科学与教育也当然地反馈于上下两个层面,即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渗透到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之中,又作为一种物质力量参与生产等实践中去。科学和教育对哲学和实践的依存,表明着它们发展的某些规律性,而中国文化的社会功利特点又是这种命运的深刻内部根源。但是这种合理而必然的反面,更多的是简单化和片面性。那就是这种依存关系只是对外部诱因的强调,并不是对科学和教育发展的内部动因和规律的尊重。同时,在反馈功能上,也只看重共性的一面,而压抑着个性的一面。于是,就埋藏了一颗十分危险的种子;导致一种离开科学、教育自身到它们的外部环境中去寻求本质的错误倾向。在这种倾向的牵引下,势必失去自己独立的本质而成为外部强势条件的附庸,也就是本体及其本性的迷失。几十年过去了,跌入了“十年动乱”,科学和教育的“附庸”地位无以附加。那时,政治成了一种普照的光,笼罩一切,把一切都政治化,使社会上所有不同事物都不同程度地失去自身本来

的色彩。任何科学、教育活动都成了政治活动,任何科学、教育的理论都必须首先接受政治的检验,并成为主导意识的教义,直接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衡量科学、教育的成败得失和优劣,已经不再有各自的标准,就看在政治上是否符合需要,是否对某些人有利。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是“科学的丧钟敲响了”。

在这种政治泛化的语境之中,语文教学从哪里来,你到底是什么,你往哪里去,能不茫然无所答吗?本体及其本性的迷失是语文教学根本性的失落,是教学质量低下的根本原因所在。在没有找回“自我”之前,语文教学指望凭借压抑多时而迸发的情,凭借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就能够拨乱反正,是不现实的。事实已经证明,那充其量只能是较全面的修复和有限的翻新。因此,对语文教学成为附庸之“乱”的“反拨”,应该是对语文本性的追寻和认定,而不是满足于捡起一些看似正确的,甚至也曾取得过成绩的零碎理论与局部经验。被称为语文教改繁荣期的匆匆过去,接下来的是沉寂的教坛和论坛,不就很说明问题吗?当然,这也可能正在孕育着真正的本体回归呢。

对此,我们还可以,而且需要扣紧语文教学,回顾得更为具体一些。发生于“五四”运动前后的“白话文运动”及其发展与结果,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作为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就是运动的主要内容。尽管这仍然是文化思想领域的革命,属于民主主义革命范畴,但因为直接指向的是“语”和“文”,应该是“语文”的本体研究范畴,因此,这对于整个近代教育,尤其是现代语文教学,至关重要。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要求自己发展,在政治上要求参与和过问,反映到文化教育上来,便要求有一种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宣传其政治主张和思想意识。到了“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便成为“打倒孔家店”、追求思想解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具体

任务之一。因此,“白话文运动”的肇始,既有“言”与“文”相矛盾的
内部问题,又由外部关系所诱发,却未及深入,便匆匆地纳入了政
治的范畴。

“白话文”,是我国汉语书面语的一种,与“文言文”相对。但它
们又是历史的概念。唐代的变文、宋元明清的话本、小说和其它通
俗文学都可称为“白话文”;宋元以后,部分学术著作和官方文书也
有用白话写的。因此,“白话文”是在一定时期与口语相接近而为
大众易于接受和运用的书面表达方式,“文言文”则是与口语相隔
离的,难以为大众接受和运用的书面表达方式。黄遵宪说:“语言
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这就道出了“白
话文运动”的内因是口语与书面语的“离合”。解决的方法,则是
“我手写我口”。而“我手写我口”又可以是以方块字记录口语,也
可以用拼音文字记录口语。历史证明,这都曾经是人们追求过
的两种取向,而后者又曾一度被认为是最彻底的革命方法,于是有
消灭方块字的“新文字运动”的兴起。

从“白话文运动”衍化出“新文字运动”,说明着什么呢?从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看,并不标志着问题探究的深入,而只能意
味着探究的转向,从内部转为外部,即牺牲“自身”以服从革命,是
“研究”的倒退或异化。如果说,“白话文运动”是立足于口语形式
与笔语形式相适应又相阻隔的矛盾,即在“合”与“离”之间寻求规
律,促使口语和笔语在离合中得到发展,更好地为交际服务,实现
其根本性功能,那么,仅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是十分必要的,
应该属于在本体内部寻找动因的研究范畴,其认识自身、寻找本性
的努力是十分可贵的。要是依照这种思路发展下去,很可能在对
“口语”“笔语”的生成与理解的内部机制有所探究和认定,从而真
正解决“我手写我口”的问题,从本源上促进语文教学。遗憾的是
“新文字运动”却不是这样。尽管“新文字运动”的倡导者、参与者